本版编辑：李步前
E-mail：f4@studytimes.cn
Tel：010—62808639

狂飙一曲从天落

——《共产党宣言》的写作与影响

□ 李海青

我们党历来重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共产党宣言》就是一篇十分重要的经典著作，被称作共产党人的“圣经”。《宣言》是马克思恩格斯为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政治纲领，发表于1848年2月，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宣言》是适应无产阶级运动需要的产物

19世纪上半叶，资本主义已经在欧洲几个主要国家迅速发展起来。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和工厂制度的普遍建立，使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日益暴露出来，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阶级矛盾异常尖锐。经济上，工人受到资本家的残酷剥削；政治上，无产阶级处于无权的地位；社会生活方面，像今天西方发达国家的医疗、教育、卫生、住房等社会保障在当时尚未建立，极度贫困的无产阶级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济，生活悲惨。这种残酷的剥削、压迫与极度困窘的生存状况必然激起无产阶级的强烈反抗与斗争。然而，由于当时无产阶级只凭朴素的阶级感情去反对资产阶级，又受到各种不科学思潮的影响，所以革命斗争一次又一次地遭到失败。这种情况表明，工人运动迫切需要科学的理论作为指导，来指明斗争的方式和前途。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恩格斯写成了《宣言》。《宣言》所要解答的根本问题就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解放道路和前景问题，实际上就是提出一个资本主义的变革和替代方案。

《宣言》是马克思恩格斯进行理论研究和理论斗争的杰出成果

马克思主义作为新的科学的世界观，是在批判继承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基础上产生的。自然科学方面，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的发现以及进化论思想的形成暴露了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荒谬，有利于人们解放思想，创立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特别是历史观。德国古典哲学主要代表人物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和费尔巴哈唯物论的基本内核是创立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前提。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合理思想成为科学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先导。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和英国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则为科学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的思想材料。正是在上述资本主义大工业时代的科学和思想条件下，马克思恩格斯适应时代要求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需要，批判地吸收人类思想文化的优秀成果，开始逐步创立自己的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在内的崭新的理论体系。这种理论研究的不断推进为《宣言》的产生奠定了必要的思想前提。《宣言》虽然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集中阐发，但其以马克思恩格斯当时基本形成的唯物史观为指导与理论基础，以正在萌芽中的科学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为支持，可以说是马克思恩格斯此前研究成果的第一次较为完整系统的阐述。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的过程，也是同各种错误思潮作斗争的过程。他们通过这些斗争程度不同地清除了这几种错误思潮在工人运动中的恶劣影响，同时也使他们自己业已形成的新世界观和以此为基础的革命斗争学说获得了极大的丰富和发展。

《宣言》是在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实践中产生的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积极地向各国无产阶级传播他们的科学思想，为建立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宣传和组织工作。1845年，马克思恩格斯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建立了共产主义通讯小组，1846年3月，在通讯小组基础上建立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他们在同各国社会主义者、工人团体保持经常联系的同时，特别注意对国际性工人组织正义者同盟的改造。正义者同盟成立于1836年，同各国工人有着长期广泛的联系，但在思想上却深受魏特林的空想社会主义、蒲鲁东主义以及“真正的”社会主义各种错误思潮的影响。为了改造正义者同盟，马克思恩格斯建议同盟领导人在伦敦成立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作为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一个分支。马克思还亲自给同盟成员作报告，宣传共产主义思想。1847年1月，同盟领导人委托约瑟夫·莫尔到布鲁塞尔和巴黎会见马克思和恩格斯，请求他们加入同盟，马克思恩格斯同意加入并努力帮助改造正义者同盟。1847年6月，正义者同盟在伦敦举行了第一次代表大会，恩格斯代表巴黎支部参加了大会的领导工作。大会决定把正义者同盟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决定出版《共产主义杂志》，用具有鲜明阶级性的新的战斗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取代“人人皆兄弟”的旧口号。大会讨论并初步通过了由恩格斯和沃尔弗起草的同盟章程草案，讨论了恩格斯起草的同盟纲领——《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决定把它印发各支部征求意见。由于是受托之作，需要照顾盟员的水平，又囿于教义问答的形式，所以这个文件显得有些粗糙和不够成熟。这个草案可以看作是《宣言》的第一稿。同盟各支部对信条草案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在讨论过程中，“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赫斯向同盟巴黎区部委员会提出了一个反映“真正的社会主义”观点的修正草案。这个修正草案受到了恩格斯的严厉批评。巴黎区部委员会便委托恩格斯起草新的纲领草案。1847年10月底11月初，恩格斯对信条草案加以修改补充，写成了《共产主义原理》。《共产主义原理》虽然继续采用问答形式，但是比信条草案有了很大进步。它共列举25个问题，内容上更加丰富，特别是对共产主义政党的纲领和策略原理的叙述更加完善，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向共产主义过渡所采取的革命措施的阐述也更加详尽。它是《宣言》的第二稿。但恩格斯对《共产主义原理》并不满意，他在11月23日致马克思的信中，认为最好是抛弃教义问答的形式而采用宣言的形式来起草党纲。1847年11月，同盟在伦敦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参加了会议。他们在会上批判了各种错误思想，阐述和捍卫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大会经过辩论，接受了他们的观点，并委托他们为同盟起草一个准备公布的纲领。马克思和恩格斯从1847年12月至1848年1月底用德文写成了《宣言》。1848年2月底，《宣言》第一个德文单行本在伦敦出版。《宣言》饱含革命激情，气势恢宏、逻辑严谨、笔锋犀利、文采壮美，具有令人震撼的巨大感染力。

《宣言》深刻地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

随着《宣言》的问世，随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和发展，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各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在《宣言》的理论启示和精神鼓舞下为了求得自身的解放与发展同各种反动势力进行了不懈的斗争，革命运动跌宕起伏，工人运动风起云涌，整个世界历史的格局在很大程度上被改变了。一方面，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自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在工人阶级和广大民众不断斗争的条件下，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矛盾得到缓和，工人阶级与劳动群众的工作与生活条件得到改善。虽然资本主义本身至今还没有灭亡，但是那种残酷剥削、压迫的资本主义早期形态应该说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中、在工人阶级与广大民众的反抗中很大程度上已经终结了。进而言之，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哪里还有不平等，哪里还存在着剥削和压迫，哪里就还需要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在世界的东方，社会主义由一种理想逐步变为现实，马克思恩格斯以自己的《宣言》创造了一个时代。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诞生了，而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又给我们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使《宣言》在当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之中广为传播。可以说，没有《宣言》，就没有俄国十月革命，而没有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也就没有中国共产党，而没有中国共产党，也就没有新中国，也就没有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随着时代的发展，《共产党宣言》必将进一步显现出其理论魅力与实践价值。

（上接3版）

村主任连连答应。习近平临走时对他们说：“你们呀，对不起你们的子弟。”后来有人对我说，这是习近平来正定后的第一次发火。

习近平对教育的重视，从他刚来到正定当县委副书记的时候就体现出来了。我跟习近平在正定的一个好朋友——贾大山也有过几次接触。他跟我说：“习近平刚来到正定的时候，他主管的工作就包括文化、教育、精神文明建设等内容。他抓文化、抓教育很上心。而且，他尊重文化人，有文化底蕴。他来的时间不长，对正定的历史和人文掌故等就能参与深入交流，他的阅读量和他吸取新知识的能力让当地的一些老‘秀才’、老‘笔杆子’都很吃惊。”

采访组：从您的讲述中，我们感觉您当时已经和习近平同志成为联系较多的朋友了。除了谈工作外，你们还聊过其他话题吗？

周伟思：在当时，也可以说是工作加朋友关系吧。采访之初，他给我讲了他的知青经历、来正定的初衷等等，我也讲了一些我的过往及感受，两人按现在的话说就是“三观”比较接近吧。后来相处时，我们之间很快就变得自然而随意了。

我们平时所聊的内容，也就不仅限于工作了。我们不仅年龄相同，经历有些相仿，而且，我在正定这里可以算是个“局外人”，他跟我聊天可能会放松许多，我们曾聊到共同看过的书，谈中外历史，评价历史人物，有时还涉及社会传闻、各地风俗习惯、个人生活等等。

有个星期天，在他那间小宿舍，我俩一边喝点小酒一边聊天，吃的是花生米、猪头肉，不知不觉到了凌晨3点钟。近平说：“太晚了，外面还下着雨，你就别回去了，在这儿凑合躺一会儿算了。”于是，我们俩就和衣而卧，侧身挤到那张小床上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7点半吧，我听见门嘎吱一声就醒了，只见习近平从食堂买了个馒头回来。他说：“咱俩就不喝粥了，都还有事，咱们喝点咖啡，精神一点。”

他拿出一罐咖啡，可能是北京朋友给带来的。那时候在那个地方这东西还是个稀罕物。我们两个用喝粥的碗冲了咖啡，一边喝，一边吃咸菜、馒头。这顿土洋结合的早餐，我至今记忆犹新。

我们有很多次谈到自己看过的书。插队时，我和他一样，都是想尽办法找书看。在当时的那种政治氛围下，本来可看的书就很少，那些古代和外国的名著差不多都属于禁区，即使冒险犯禁“偷窥”，能弄到手的还是非常有限。有时实在闹书荒了，甚至见到有字的东西都“饥不择食”，过期报纸，残缺杂志，甚至连《赤脚医生手册》都一页页翻完。

习近平的情况则不同，他从北京去陕北的时候就带了两箱子书，他和他同伴们的“书源”比一般人还是要多一些。所以，两相比较，他的阅读范围比我要宽广不少。当然，我们也有一些共同看过的书，比如中国古代四大名著，苏联、法国的一些小说，但他看的那些涉及哲学、经济、政治方面的书籍，很多都是我望尘莫及的。

我们这一共同爱好都一直保持下来了，但由于工作岗位的不同，我们的阅读方向仍然各有侧重。

有件事应该能说明问题，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们那届“老初一”，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报名参加的勇气，因为我们初一还没放暑假，“文革”就开始了，就再没上过课了。现在有了机会，但底子实在太薄太空。正在工厂当学徒工的我，仗着读书较多，居然不知天高地厚地要尝试一把——当然只能选择文科，靠语文、政治、历史、地理拿分，数学没学过，干脆忽略不计。这样，在正常上班外，其余时间全部像魔鬼训练般的疯狂复习。

考试结果出来，我数学得了7分，但其他各科成绩都是全省比较靠前的，于是我侥幸成为了78级大学中文系的本科生。

现在我在想，如果习近平当年没有被推荐上清华，如果1978年他和我一起参加高考，他的成绩应该比我还要好。

在他正定的办公室和宿舍，书架里、办公桌上、床边，都是触手可及的各类书籍。我印象中有《大趋势》《决策学》《棉花栽培技术》《走向未来》丛书等等。

此外，我们还谈到过老电影、老歌曲等等这些知青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习近平爱好比我更为广泛，我从小对体育方面兴趣不大，而他非常喜欢足球，还有篮球、拳击和摔跤等等。此外，金庸和古龙的武侠小说、美国的西部片等等他也兴趣不小。记得有一次我说我对武侠片不太感冒，他说：“工作多、脑子乱的时候，偶尔作为一种消遣，可以帮助缓解一下压力，放松放松。”

有时候，他北京的朋友来正定看他，我也参加他们的聚会，大家无拘无束地谈天说地，带来很多新鲜空气。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是否也从外地来的朋友身上获取了一些改革的信息和创新的思路呢？

周伟思：这是毫无疑问的。他的这些朋友，有的是给正定介绍合作项目的，有的是来推荐技术人才的，有的是给他送书的，还有的是专门来看他的。在与他们的交流当中，习近平获得了很多重要信息。

当时不像现在互联网时代，上世纪80年代初，电视机还没普及，人们除了通过报刊、广播了解外面的世界，再就是当面交流传递信息。

习近平与朋友相聚时，说话不多，总是面带微笑认真听着大家七嘴八舌，有时也会针对性提问或表达自己的看法。我在一旁还观察到，不管他的朋友发言是有条有理的，还是咋咋呼呼的，他都能不动声色地听他们把话说完，不会轻易去打断别人的兴头。

他善于通过各种机会，时时刻刻吸纳新东西，了解中国和世界的各种变化，尤其注重经济、科技发展的新趋势、新动向。虽然是业余时间闲谈，但他关心的东西还是和改革开放与经济建设相关的。

习近平当年在正定所做的很多事情，如开发旅游项目，力推工副业、服务业的扩展，现在看起来好像不算什么，但在当年当地确实需要很大勇气和知识储备才可能去做。

在那个阶段，正定县上上下下开展的发展战略大讨论，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的，当然是习近平本人。不过，他对自己的评价倒有点“见真佛只谈家常”的味道：“我常常务点虚，讲新产业革命，讲第三次浪潮，讲80年代的领导方法。我只是想起一点酵母的作用。”

习近平不止一次给县委、县政府一班人，还有县机关的工作人员、乡村干部说过这样一件事：一群根正苗红的参观者到近两年商品生产取得长足发展的广东省南海县观摩考察，他们看到农民穿了西装、打了领带，甚至穿了牛仔裤、花衬衫，贸易市场上的大小“财东”比高级干部还阔气，街头的茶座里飘着他们听不懂的音乐。一到晚间，霓虹灯光怪陆离，他们眼花了、头晕了，不禁抱头痛哭：“我们辛辛苦苦搞社会主义搞了这么多年，没想到资本主义这样快就复辟了！”

每当习近平讲到这里，不同的听众都会哈哈大笑起来。其实，习近平就是通过这种潜移默化的方式，慢慢转变干部的思想观念。

习近平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他毕竟有过几年大队支书的实践，对农村的人际关系、农村急需解决的问题，包括生产技术、水利建设、生活条件等各方面的问题都很清楚。陕北和河北，同处北方，农作物品种相差无几。如果换另外一个常年在机关工作的人下来担此责任，指导农村工作，恐怕会很吃力。在农村一些相对复杂的问题上，下面反映给他的难题，甚至有乡党委书记跟他请示一件麻烦事，他很快就会给出一个想法，告诉该怎么解决。有些乡党委书记和他相比，可能还没有他的基层工作时间长呢！

同时，他还有一种前瞻性的战略眼光。战略眼光和务实精神这两点结合起来，很了不起。当年，他虽然只是个县委书记，但他的眼光并不只是放在县里的大事小情上，他实际上是把正定作为中国农村的一个试验点，通过在正定，把他心里的想法付诸实践。他还在经济学家于光远等专家的帮助下，搞了一个农村研究所，这个研究所就设在一个村子里，人员都是兼职的，他们通过认真探讨、研究，就“三农”方面做了很多小范围的试验，其中包括分配制度、土地制度、村级选举，还有具体到经济作物的选择、新品种的选育、新的农业技术推广、农业设备的分配、农村基本建设、乡村的房子、环境、公共设施配套等等，为农村发展中的很多具体问题开辟了“试验田”。习近平还把一些国外乡村发展的新模式，也放在这个研究所里进行实验，全方位地去寻找中国农村未来的发展道路。这个研究所做了很多非常有益的探索和实践，给正定以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很显然，花精力和成本搞这种着眼于长远、难见短期效益、失败风险不小的探索实验，对于某些急功近利的地方领导干部来说，肯定是提不起兴趣的。

我和他同样当过知青，我也短期当过生产队长，但我那时打心里不愿在农村扎根，只想尽快跳出“农门”，在对农村的理解、对农民的感情等方面，他都值得我学习。习近平在梁家河与正定时期，都要比我在农村时用心许多，别的不讲，他对老百姓那种发自内心的亲切与关心，我是亲眼见过的。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对农民和农村的感情确实是发自内心的，您能举个您亲眼见到的具体例子吗？

周伟思：好的。一天傍晚，我和他在他办公室正说一件乡镇企业的事，一个农村大娘推门就进来了，嗓门很大：“习书记，你要为我做主啊！”接着就诉开了冤情。她口音较重，我听不太清，好像是在说她和村里人的纠纷。

当时我想：怎么这样？正定全县几十万人，如果谁有事就直接找县委书记，那还了得！但习近平显得一点儿也不着急。他请老太太坐下，给她倒了杯水，让她慢慢说。

我随他下村时，他很自然地和农民一起坐在地上、石头上，和他们聊庄稼活，拉家常。去农户家，老百姓拿个饭碗给习近平端水，他接过来就喝，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和嫌弃。

采访组：经过采访和调研后，您为什么确定用报告文学这种体裁呢？

周伟思：关于怎么写，我是采访过半后才开始考虑的。如果用通讯、特写之类的形式，我觉得不足以展现他的内心精神层面。

我跟他说：“近平，你的经历，你现在的工作生活都让我觉得新鲜，别有意味。现实生活里，年轻人中，有不乏高谈阔论的，也有闷头自我奋斗的，像你这样既目标明确，又全身心投入实践的，对年轻人很有启迪意义。这次我不想用通讯之类推出一个模范干部典型，我打算用小报告文学的形式来写你，这样，便于将你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作较详尽的叙述，尽量用全方位的视角给读者介绍一个可亲可信、有血有肉的年轻干部。”

他微微一笑，“这样也好，《中国青年》上不是正在争论‘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么？你实事求是地写写我的实践与体会，就算我从基层青年干部的角度发个言吧。”

我又补充说：“我不会去强调你的政绩，也不搞数字罗列、前后对比之类。多讲具体事例，尽可能还原真实。描述一些你成长过程中的心路历程，就像与读者交流交流对时代的认识、对人生的感悟。”

他点头认可了。

就这样，我们基本敲定了这个稿子的写法和基调，我便回石家庄开始动笔起草那篇《而立之年》了。初稿出来后，我特地去正定让近平同志提修改意见，他让我尽量删掉溢美之词，同时提出，对他们发展正定经济的有关设想方案先不要写。

采访组：稿子发表后，你们在工作上不再有那么多接触了，后来是否还有联系呢？

周伟思：有联系，偶尔还见见面。

有一次，石家庄的一帮湖北老乡，约我周末到正定去玩，因为正定素有“九楼四塔八大寺”之称，古迹较多。

我跟他们说：“正定的书记跟我算朋友呢，要不，让他请咱们吃顿饭？”

大家当然想见见这位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我给习近平打电话说明原委，他说：“行啊，周末我正好在，你们来吧。”

星期日，我们上午游览了隆兴寺等古迹，中午就到县招待所去了。

我们到招待所时，习近平正好也来了。他自掏腰包，用几盘农家土菜招待客人。席间，我给他一一介绍，老乡中有机关干部，有工程师，还有部队的同志。近平热情地和大家聊开了家常，还时不时请教相关专业知识。

后来，我还向他推荐过一些新出版的书籍。有一次，我看到一本叫《夜与昼》的长篇小说，描写了当代中国自上而下发生的巨大变化，内容主要是政治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涉及范围较广、较深。我就给近平打了电话，建议他抽空看看。他问了主要内容后说：“好，我马上去找。”

不久之后，我见到他。他说：“你知不知道《夜与昼》又出了第二部？”我说：“不知道啊。”他说：“叫《衰与荣》，我已看过了。”

采访组：您记得真清楚啊！

周伟思：是啊。这一晃30多年过去了，回想起来，对习近平的采访，应该是我新闻工作生涯中，印象很深、收获很大的一次经历。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离开正定后，你们之间还有交往吗？

周伟思：他在调往福建临动身的前一天，特地到石家庄跟朋友们相聚话别，那天大概去了20多人，我也在被邀请之列。

习近平到厦门后给我来过一封短信，告诉我他的电话，说有机会欢迎去厦门见面。

1986年元旦刚过，我去杭州参加一个笔会。我事先给他打电话，说会后顺道去厦门会会他。他说，好呀，欢迎你来。

1月19日，我坐火车到了厦门。那天，我是下午4点左右到的，我一进宾馆房间就跟他联系。他说：“你把房退了吧，马上到我宿舍来，离得很近。”

我很容易就找到了他住的小区，是三楼一个不大的单元房，所谓“客厅”只是个过道，里面有两间卧室。

坐下后，他说：“真不巧，我明天有公务要去北京，是明天早上的飞机。你今晚就住我这里，留两天在厦门走走看看吧。”

我说：“厦门我来过的，这次是专门来看你的啊。这样吧，我明早跟你去机场，如能补上机票，正好跟你一起飞北京，再回石家庄就方便了。”

我们俩出去吃了晚饭，边散步边聊天回到他家，到家后又谈了一会儿各自的近况和其他话题。

第二天一早，我俩起来做早餐，他说：“你去烤几片面包，我煮牛奶。”我看了一眼那个烤面包的小铁盒，赶紧说：“不会用这玩意啊，我煮牛奶，你烤面包吧。”

就这样，习近平烤了几片面包，让我从冰箱里拿出两个咸鸭蛋——我们在一起又吃了顿土洋结合的早餐。

后来，我们俩几次迁徙，调动工作，联系就渐渐少了。

采访组：您与习近平同志这些交往，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也让我们非常感动。请您谈谈对他的总体印象。

周伟思：第一，他有着非常强烈的使命感，始终有自己清晰的奋斗目标。

第二，他意志坚定，而且脚踏实地、低调务实，善于学习，特别沉得住气，看问题不过激、不偏颇，对事物能全方位的理解和把握。

第三，他包容性很强，待人诚恳厚道，能主动吸取各方面的信息和建议，能与不同身份、不同性格的人交朋友。

第四，他非常了解国情，从大队支书到总书记、国家主席中间那么多阶梯，除了乡镇这一级外，其他则一步没少。

从黄土高原到东海之滨，从山村窑洞到繁华都市，他通过亲历或了解，对各个阶层各种环境的理解程度，是一般人无法比拟的。

还有一点，就是习近平非常有大局观和创新精神。在不同时期，他始终能洞悉和顺应时代的发展潮流。

因此，在当代，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位立足本土并具有全球视野的优秀领导人。